

专题研究: 大学章程

主持人言: 主持人言: 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指出“中国大学的问题 根本原因是行政控制一切。”本专栏前面三期针对我国大学泛滥的行政化诟病,从高等教育理论视角,集中探讨了大学“去行政化”问题。可是在实践中,如何“去行政化”,确保学术权力不受行政权力控制,却成为困扰今日我国大学发展的一大难题。尽管许多大学采取了建立教授会、改革学术委员会等一些举措,试图解决大学内部的行政化问题,但我们遗憾地看到,行政化并没有实质性消退的迹象。尤其值得忧虑的是,高擎“去行政化”改革大旗的南方科技大学,在2011年5月对2名正局级副校长的选拔,昭示着这所大学有行政化回潮之势,再次让国人感受到大学“去行政化”之路充满了荆棘。对此,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说,学校虽然提出“去行政化”,但如果完全跟政府不对接,也有困难之处。可见,大学“去行政化”仅靠理论的研究、舆论的支持、大学的努力恐怕是力所不及的。目前,我国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践之路如何走下去?许多大学又开始了制定章程的探索,期望通过被称为大学宪章的大学依法办学的纲领性文件大学章程,来改变大学愈演愈烈的行政化趋势。其实,早在1999年1月1日,我国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申请设立高等学校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章程。章程应当规定学校名称、校址、办学宗旨、办学规模、学科门类的设置、教育形式、内部管理体制、经费来源、财产和财务制度、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章程修改程序、其他必须由章程规定的事项等内容。但遗憾的是,在《高等教育法》施行的10余年间,依法制订大学章程的高校为数不多。2010年12月16日,教育部公布,北京大学等26所部属高校,将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建设。对于此举,我们再一次充满了期待。为此,本专栏第五、六期开辟“大学章程研究”,本期选择了《制定高等学校章程的意义、内容和原则》和《大学章程及其制定的策略探讨》这两篇文章,对制定大学章程的意义、内容、原则与路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希望对我国推进大学章程建设的改革有借鉴价值。

(特约主持人 刘 尧)

制定高等学校章程的意义、内容和原则

马陆亭

(教育部 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16)

摘 要: 分析了国外大学章程的法理意义和我国制定高等学校章程的现实意义,认为章程是高校自主办学和外部对高校实施影响双重作用的产物,应以制定章程为契机推动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在内容上,章程反映着高校和社会特别是和政府的关系,彰显着高校的使命要求,重点是内部治理结构。鉴于目前各高校对章程理解的不同,章程的制定可遵循先简后繁、充分协商等原则,初期允许多种选择先做起来,后期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改革成果予以规范。我国现在正进行的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可以启于并终于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

关键词: 高等学校; 大学章程; 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 G64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1)05-0001-06

收稿日期: 2011-04-23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DIA050141)

作者简介: 马陆亭,教授,高教室主任,从事高等教育理论政策研究。

主持人简介: 刘 尧,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从事高等教育学、教育评论学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 2011-07-26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2.1774.G4.20110726.1105.002.html>

DOI: CNKI: 32-1774/G4.20110726.1105.00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已颁布实施,在“完善中国特色大学制度”中要求“各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教育部2011年工作要点指出^[1]：“要发布《高等学校章程制定办法》，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在2007年教育部法制办公室就全国高校章程建设的整体情况进行的调查中，有563所高校报送了章程或章程草案^[2]。目前，几乎所有高校都开始了制定章程的思考或探索，但思路、想法很不一致。例如，有的高校提出章程要列入立法程序，有的提出要由政府审批，有的提出在主管部门备案即可，有的则是通过学校党委会或教代会而生效。想法、做法的不一致代表了大家对章程的理解不同。本文对章程制定的法理意义、现实意义、要素内容和制定原则进行探讨。

一、境外大学章程的法理意义

章程是约定和阐述独立主体使命，界定各利益关系的责任和义务，书面写定的有法定意义的组织规程。国有宪法（Constitution），联合国有宪章（Charter），任何一个有独立自主权的机构都需要明晰组织规程以使人了解自己的使命，规范自己的组织运营。因此，章程有大学“宪法”之称。章程有效的前提是大学具有办学自主权，否则就是内部规章。

（一）传统大学特许状的合意之义

历史上总体的脉络是先有特许状后有章程，但后来因时代和国别不同它们也交织在一起^[3]。大学是最早的特许法人之一。

首先，特许状是由统治者颁发的办学执照。按照传统，大学特许状一般由教皇或国王颁发，赋予大学开设课程、招收学生、聘请教师、制定学术标准的权利。大学特许状的权威性来自于教权，中世纪教会拥有足以与世俗权力抗衡的权力，因此教会颁发的特许状赋予了大学诸多特权，但宗教改革之后赋予大学特权的特许状主要来自于王权和国家权力。在地位上，大学特许状有点像当今的执照或政府批文，是界定大学与政府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但其内容又规定得非常详细：确立大学特许法人的法律地位，规定大学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纲领性地划分大学内部各方的权力、职责。

其次，特许状是大学实现自治的保障。大学

经由特许状而获得独立于出资人和举办人的独立法人地位，享有学术自由和独立的财产权，并享有独立于股东或发起人的永久存续权，因而成为大学自治的保证。大学特许状所赋予大学的权利甚至是超世俗的，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凌驾于地方法律。英国1209年牛津的罢教和东迁，作为地方妥协的结果，1214年部分迁徙的师生重新回到牛津，牛津市长被要求发誓尊重大学的自由和习惯。特许状具有契约性质，该性质限制了政府任意改变大学的权利、义务范围和性质的能力。

再次，特许状是政府介入大学治理的一个机制。大学成立以来，就一直是政教双方争相争取的力量，并因特许而获得自治权利。但是，大学自诞生以来又从来没有实现过完全的自治，“在其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出现之后，就一直处于不同社会势力和力量的作用之下，最初是教会、皇帝、国王和城市的交互影响，之后是政府、市场和科学的相互作用。”^[4]自治是一个程度和范围的概念。

（二）现代大学与政府间的契约关系

现代大学走出象牙塔，与国家发展、地方经济联系在一起。学术成为一种“资本”，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要素，大学制度的基础由学术自由主义转向学术资本主义。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如何保证大学在接受政府资金的同时，仍然保有相应的学术自治成为问题的关键。

契约即一种合意，是解决人际纠纷、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是达成共识、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市场经济社会是契约型社会，契约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关系。在契约理论的框架下，政府需要依据社会发展目标向大学购买教育等学术服务。政府与大学建立契约关系，是实现政府目标、保障学术自治、维护各自职能的一种有效而可行的方式。

契约管理实质上也是一种目标管理。目标管理既是政府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一种转变，也是政府由放任到介入大学管理的一种方式。德国高等教育一直有着受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的传统，近年来也开展了建立“基金会大学”的实验，以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英国专门成立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以作为政府与大学间的缓冲机构，但其质量评估是财政科研拨款的基础。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政府都将拨款与大学绩效评估挂钩，在拨款公式中加入了政府倡导的绩效指标。而日本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和法国对大学的合

同管理,则是政府对高校实施契约管理的直接例证。

(三) 大学章程的治理意义

由于各个时期、不同国家(地区)大学发展背景的差异,大学组织规程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如其英文表述有:大学历史悠久的法国为 Statutes(法规,章程)及 Ordinance(法令),英国上有 Charter(特许状,授予特种权利的法令或正式文件)下有 Statutes(章程,条例),德国有 Statutes 和 Constitution(章程,宪法),美国有 Charter、Regulation Bylaws(地方法规,内部章程,细则)、Statutes 多种表述方法,日本将其称之为 Charter(宪章,共同纲领),我国香港地区上为 Ordinance(法令,条例)下为 statutes(规程),叫法虽异但其内容却有着一致性或相似性。当然,特许状和章程毕竟还是有所不同的,如英国大学章程依据特许状或国会法案而制定,美国大学的章程以特许状为基础演变而来。章程就是规矩,体现着法治精神。

首先,章程是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产物。为了使大学真正拥有办学的自主权,通过立法确立其自主地位,通过章程确定其运行规则,是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5]。大学因自主办学而需要有章程,大学章程会同有关法律,厘清了大学和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界线,明确了大学自治的空间和自治权的范围,因而成为大学运行的合法依据,也从根本上确立了大学的管理运作体制。

其次,章程是外部对大学实施影响的产物。特许状或大学章程本来是大学自治的象征和保障,但在强权面前它们又是脆弱的。虽然教皇和法国国王相继给予巴黎大学以司法特权,但权力毕竟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干涉大学自治易如反掌。13世纪中期,法国亚历山大四世通过发布“新的光明之源”谕旨,表示支持托钵会修士,并毫不犹豫地取消了大学的特许权。因此,大学不能超越社会而独立发展。英国牛津大学从早期教皇特许、到1571年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成立法案(Act)对其法人地位的确认、再到1636年查理一世的皇家特许状(the Great Charter)对大学权力的强化与分配,以及从多个章程版本的并存、其修改要不要得到枢密院批准、再到2002年“女王会同枢密院”(Queen-in-Council)审议批准的新章程生效,无不体现出外部与大学之间及大学外部相互之间对大学的控制、妥协与协商。时至今日,

英国大学特许状和章程需要获得枢密院批准才能正式生效,其废除或修改也需要获得枢密院批准。日本大学原来并没有章程,但伴随着大学法人化改革开始了宪章的制定工作,有意思的是日本大学宪章的英文译法采用的是 charter,也就是英国特许状的用语,这不能不让人感受到政府影响的作用。

二、我国制定高等学校章程的现实意义

我国1995年的《教育法》规定学校有按照章程行使自主管理的权利,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规定申请设立高等学校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章程等内容,说明了章程的法律地位。但实践中目前高等学校绝大多数并没有章程,说明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办学的实体。

(一) 以制定章程为契机推动高校依法自主办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进行了深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全方位变化及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有效地激发和释放体制的活力,该项改革于世纪之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高等学校“自主办学、自我约束”的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体现在学校管理的行政色彩还太浓、政府与学校的责任边界的不清晰、学校自身的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即在治理模式上缺乏有法定意义的组织规程,因此经常陷入权力“放”与“收”的循环,这也才有近年来的高等学校“去行政化”之争。

有学者通过指数评价分析,提出从1995年到2005年学术权力在政府与高校之间的下放程度指数仅从0.611变为0.615^[6],变化很小。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年来一方面在进行着下放权力的改革,另一方面具体的行政部门又在寻求工作的“抓手”。比如:这些年项目的增加非常快,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方式行政化倾向严重,导致高等学校以行政化的方式和逻辑获得高等教育资源。今后改革的重点应是着力解决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完善学校的治理结构。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校法人需明晰两种关系:一是办学的外部关系,即所谓的面向社会和依法办学;二是办学的内部关系,即所谓的自我管理和约束机制。第一种关系主要由法律明确,章程承接一下;第二种关系主要由章程明确,辅之以具体的

规章。因此,章程“上承国家教育法律法规、下启学校规章制度”^[7],是推动和规范高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基本依据,是处理学校与政府、社会及其内部关系的准则,是大学在法律框架下行使自治权利的自我规范,有大学“宪法”之称,具有法律效力。

(二) 章程对外部而言是学校和政府间的一个合约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有赖于一种科学的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方向是已经确立的“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体制”。为此,需要重塑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充分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规范政府管理高校的行为。

政府和高校都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机构^[8],二者在存在形态和地位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平等性,彼此的领域性质不同。既然二者都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那么就应以符合各自规律和运行规则的方式运转。高校不是政权机关,不能用政府管理模式管理学校和进行学校内部管理。高校与政府间的平等、伙伴关系,并不代表高校发展和管理上的无政府或无序,只说明只有当它们真正是自己时才能更好地实现其使命。

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已与社会经济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优先发展教育、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强国等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办学已不仅仅是处理学校内部的事务,还涉及与国家、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高校可以自治,但它不能超越社会而独立发展,特别是不能不顾忌统治者的利益和期望;政府也不可能放弃自己应有的责任,放弃对高校的支持和管理。因此,有效的管理应是学校意志和国家意志的综合作体现,满足着政府目标和高校自治的双向要求,这样才能实现学校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管理模式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政府对高校的契约管理是能满足这种要求的一种方式。即在《高等教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发展战略的框架下,政府对高校提出目标和要求、批准学校的章程和发展规划,提供财政及政策支持、进行绩效评估,高校在宏观框架内实行自主办学。

章程可视为政府与高校间的一种合约。在性质上,这种契约关系为行政契约,介于行政行为 and 私法契约之间,兼具行政的公务性和契约的合意性。

(三) 章程对内部而言是学校的一个组织规程

首先,章程要呈现出对高校使命的彰显。高校的使命及其具体的办学目标与特色、定位密切相关,章程必须予以明述。与使命一致的事情可以做,不遵循使命的事情不能做,保证高校不“见利忘义”、盲目发展。体现使命的办学目标,一定要明确、具体、稳定,要把学校的定位规范下来。明确使命,还能使政府、高校内部、社会机构与大众等主体从战略高度思考学校的发展方向,也会对教师和学生的行为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指引作用。如日本大学的宪章,在自己的名字前放置的定语是“世界的”东京大学而不是“日本的”东京大学^[9],从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立足于全球视野和全球思维的战略选择高度和指向,而其他地方公立大学则表现出较强的务实性。

其次,章程要清晰地界定内部治理关系。内部治理是高校章程阐述的重点,主要体现在决策机构、行政机构、学术机构的划定上,包括机构间的运作程序,各机构及重要岗位的职责、义务等。

三、高等学校章程的要素内容

《高等教育法》第二十八条提到的有关章程涉及内容的规定,系法律层面的要素要求,需予以遵循。从工作推进的角度看,章程是在学校使命与目标确立下,对外部关系的一种责任说明和对内部管理的一种运行规范。主要内容有:

(一) 高校与外部关系的界定

《高等教育法》指明章程应规定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经费来源,章程修改程序等内容,直接涉及高校的外部关系。高校外部关系的明晰,将使其运行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有章可循,有助于高校成为自主办学的实体。

章程应呈现高校与举办者、地方、校友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内容,明确社会各利益群体参与治理的方式。公办高校还要体现国家意志和公共利益,并结合学校的自身定位要求突出一些重点,如高水平大学如何兼顾自主办学和公共利益需求、行业特色大学如何加强与行业的联系、地方大学如何与地方发展融为一体,这些关系影响着学校的治理方式。

(二) 高等学校使命和办学目标的阐述

即《高等教育法》提到的办学宗旨。宗旨的阐述可能共性因素会有一些,因为同为高等学校当然会有一些共同的属性:育人是根本,都有着通

过教学、科研、服务贡献社会的三大功能。但是,定位很重要,共性之后要有特性,各高校的使命要有所区分,从宏观角度看整个高等学校系统要与社会多样化的需求相匹配。在对国外大学的考察中,发现使命(mission)一词是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区分该校与他校不同的关键所在。而我国高校的校训、宗旨陈述比较泛化。

确定了定位之后,就该认真探讨遵循什么样的教育理念来实现定位,即理念要与定位相一致。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大学要为全国服务,注重为有志青年公平地提供机会,增强国际开放性;地方性高校要更多地为地方发展服务,有地方特色。这里的变化要更多一些,因为理念有多种多样,如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就有一个光谱地带,不同的学校可有不同的选择,这也是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基础。

有了定位和理念,办学目标就呼之欲出了。这里需注意的是处理好目标贴切性和激励性的关系,使政府、社会、师生广泛认同并努力为之奋斗。使命、目标一旦确定,就要有稳定性,要体现出依法治教的精神,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办出特色,不能朝令夕改。

(三) 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规定

《高等教育法》提到高校章程应包括的“内部管理体制、财产和财务制度”事项,尽管只有寥寥数语,但却涉及复杂的管理命题。内部治理结构的清晰,可使得决策和运行有章可循,有助于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益和完善自我约束机制。

需要解决好高校的内部领导体制。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等内容是见诸法律文本的内容,必须遵循,我党的执政地位不容动摇。但高校在其制度建设中应当创造性地探讨“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实现机制,通过科学合理的责任分工保证办学的有序、减少矛盾并激发办学的活力。可以借鉴国外大学董事会与校长关系的责权划定先确立一些原则:如具体界定党委和校长的职责,党委通过对战略规划审定等把握学校的发展方向,党委负责校长的遴选工作,副职由正职提名等,并明确在大的原则框架下各高校可以有所不同。

要设定好行政管理机构。管理机构及其重要岗位的职责应当清晰,机构的运作程序应当明确,重要职责和关键性程序应当在章程中写明,再辅

以相应的规章,这是办学效率和约束机制的制度性保障。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要注重学术和行政两支队伍的建设,他们的管理和激励模式是不同的,要精心铺架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并行成长的学术生涯和管理生涯“双梯阶”发展道路,努力打造精干、高效、专业化的行政管理队伍。

从制度上保证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等组织对学术问题的决策作用。这既体现了对学术规律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学术人员价值的肯定。教育领域是一个与智力有关的被严密规则化的人才市场,因为文化资本不直接等同于经济资本,所以学校教育系统能够相对公正地保持独立性和自律性,这也是高校的尊严所在。大学最早的模式是行会性组织,教授治校其实就是学者共同体模式。目前,大学都是巨型组织,要实施战略管理,但不能因此而丧失“共同体”这一在大学产生之初即具有的形态。为此,需要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特别是加强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形成高层以战略主导、基层以学术主导的管理机制。如建立教授会为院系重大问题的决策机构,以减少行政的官僚色彩和权力寻租现象,增强科技创新的活力。

(四) 办学的其他客观性要素

即具体的事实性要素,也就是《高等教育法》所提到的学校名称和校址,办学规模和教育形式,以及骨干的学科门类设置和发展方向。

学校名称和校址看似简单,其实是十分严肃的事情,把它们写入章程,就表明不能轻易改动和盲目发展。联想到前一时期的改校名和扩建成风,毫无特性,就需要反思一下发展的章法是否有点乱。办学规模也是这样,论证好并写入章程的办学规模是不能轻易被突破的,因为规模的突破必将引发办学模式的变化,进而导致学校使命、目标的改变。普通高校的教育形式有可能会比较一致,都是多种多样的,但要明确以哪种为主,教育形式要与其使命、目标相一致。

学科门类设置要体现自身的发展方向和特色。这里既有宽口径设置以增加灵活性的问题,又有把自己的特色学科做精做强的问题。学科建设对高校发展的重要意义各校都很清楚,重点是要论证好、规划好、建设好,围绕学科、专业做好基础条件和团队建设工作。

四、制定高等学校章程的原则

目前,各高校对章程的理解很不一样,甚至不

排除有些学校就打算等别的高校制定后借过来抄一抄、走个过场。章程的制定,重在使它起到大学的“宪法”作用。为此,可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先简后繁。综观国外的大学章程,有简有繁,如日本的比较简短、英美的比较繁多,从中可以发现一个由简至繁的过程。因此,不要期望章程的制定一步到位,章程在内容的选择上需要有一个甄别、充实、完善的过程。初期,不能太繁,要定大事,要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具体的细节可由章程之下的规章予以体现。

第二,充分协商。制定章程绝不仅仅是少数领导和行政部门的事情,必须有教师的广泛参与。英国教育家怀特海说过,“教师的意见以及对大学办学目标的共同热情是办好大学的唯一有效保证。”章程的制定是与教育改革和制度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和充分协商,是一个凝聚力量、达成共识的过程。只有在构思未来发展时容纳更多的教职员工,实施时才能得到较好的配合,章程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

第三,前期多样。章程的制定、生效与修改,涉及对章程属性的理解。笔者认为它是大学自主办学和政府宏观调控结合的产物,因此相当于一个法定的合约,需共同签署,需要政府批准方能生效。《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章程的修改,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核准”,就体现出了这个意思。但是,由于近期我国高等学校的章程制定还是新生事物,需要有个完善的过程。在过程中,章程的生效与修改可以有学校主管部门的备案制、批准制、政府办公会议通过的政策性文件和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机关)审议通过法规性文件等多种选择,不要急于规范,以利于工作开展。因为前期就去规范,往往容易按照最初级的方式如备案制去统一行事,这样反而不利于改革与创新。前期,要允许多样。

第四,后期规范。完善后的章程应该是改革后的成果结晶,需要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联系在一起。高等教育的改革最终要建立让广大教师醉心于学术工作的机制,创建有助于学术创新和学生健康成长的制度,使大学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而界定好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明确高校的治理结

构,并以规范性的章程保证,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内涵。因此,章程要体现最终的改革成果,需要学校与政府的共同认可,这时需要规范,需要权威性和严肃性。根据学校的层次、类别和使命差异,章程生效与修改的最低层次是学校主管部门批准,最高层次是立法机关通过。

高等学校管理既是一项日常工作,更是一项制度建设,需要制度的保证。为此,我们既需要以制定章程为契机推动高校依法自主办学,更需要把改革的成果以章程的形式固定和规范下来。即此轮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完善和建设,可以并应该启于高校章程制定、终于高校章程制定。总之,高等学校的科学发展取决于制度,需要法理性的章程把学校与政府、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及内部治理结构明确下来,不因人而异,章程的制定正是要体现这种依法治教的精神。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教育部 2011 年工作要点 [N]. 中国教育报 2011-02-10(4).
- [2] 王大泉. 我国高校章程建设的现状与途径 [J]. 中国高等教育 2011(9): 16.
- [3] 马陆亭. 大学章程地位与要素的国际比较 [J]. 教育研究 2009(6): 69-76.
- [4] 张斌贤. 关于大学史研究的基本构想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5(3): 23-26.
- [5] 马陆亭. 大学章程法治精神和要素内容 [J]. 中国高等教育 2011(9): 13-15.
- [6] 刘亚荣. 我国高校学术自主权变迁的实证研究 [J].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教育 2008(11): 34-37.
- [7] 牛维麟. 现代大学章程与大学管理 [J]. 中国高等教育 2007(1): 45-48.
- [8] 马陆亭. 政府与高校间的契约型管理模式探讨 [J]. 中国高等教育 2008(21): 14-16.
- [9] 王晓燕.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中的大学章程建设 [M]//马陆亭. 大学章程要素的国际比较.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 293.

(责任编辑 东彦)
(英文摘要下转第 11 页)

The University Statutes and the Strategy for Their Formulation

WU Shao-fen

(Journal of the China Higher Education , Beijing 100082 , China)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statutes are usually called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 which serves as the bridge to connect the external laws and the internal regulations in the school. The statues have the features of authority , standard , stability , justifiability and practicality.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he urgent need to find their solutions , efforts must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 the department in charge of education should further publicize the importance of formulating the statutes and strive to promote their formulation by exerting guidance over the actual work. Second , the university leaders should show their concern about the statutes by taking the initiative and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statutes construction. Third , the statutes should be made in a rigorous ,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manner so as to be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Fourth , the content of the statutes should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meanwhile be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chool and its features.

Key words: university statutes;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 modern university institution

(上接第 6 页)

Significance , Content and Principle of Formulating the University Statutes

MA Lu-ting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 Beijing 100816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legal significance and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formulating the university statutes , the present article maintains that the statutes are the result of the school-running autonomy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external world on the school and that the school-running autonomy sh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formulation of the statutes. The content of the statutes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society , especially the government , makes clear the missions of the school , and focuses on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l governance. In view of divided opinions on the university statutes , the from- simplicity-to-complexity principle and the principle of full consultation should be followed at the beginning by making various choices , which will later be standardized as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institution.

Key words: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university statutes; management system